

Se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比较文学与 文化研究丛刊

第4辑·2016

张晓希◎主编

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陈跃红

印度佛学华化与中国诗学传统 孟昭毅
门薇薇

仲春时节里汉诗唱酬的一天——明成化十二年二月廿五日

中朝诗歌交流述论 赵季

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黎跃进

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 张晓希

“情性”说发展述评 周和军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Se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比较文学与 文化研究丛刊

第4辑 · 2016

张晓希◎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 第4辑, 2016 / 张晓希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17-3478-5

I. ①比… II. ①张… III. ①比较文学-丛刊 ②比较
文化-丛刊 IV. ①I0-03 ②G0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9955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 第4辑, 2016

出版人: 葛海彦

责任编辑: 邓彤

责任印制: 刘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178千字

印张: 13.5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0.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本书由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
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

《比较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晓希

执行主编 曾 琼

编 委 会 (按姓氏拼音顺序)

蓝 峰 黎跃进 潘道正 藤田梨那

杨 果 曾 琼 张绍斌 张晓希 周和军

编者前言

2016年11月25至26日，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主办、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承办的“跨文化视野下中国诗学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国际交流中心成功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华侨大学、吉首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大同大学、玉林师范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及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世纪中国诗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诗学与东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诗学的方法论更新”“当前比较诗学发展的新趋势”等问题各抒己见、热烈对话。与会者或以翔实的考证剖析中外诗学的不同思维方式；或就中国比较文学界前辈大师的诗学思想细读阐发、掘其深意；或从跨学科、跨文化视角对中外诗学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详加爬梳、小中见大；或以具体的诗学概念为中心汇通古今、层层推衍，在初雪的津门共同演绎了一场学术的佳宴。本辑《丛刊》有幸以“诗学论坛：中国诗学与世界”为题发表此次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因而名之曰“诗学专辑”。

除获允收录“跨文化视野下中国诗学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之外，我们还有幸得到了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陈跃红教授所赐特稿《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以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为例》。陈先生借西方理论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问题，就中国学者大力倡导却始终饱受争议的

“阐发研究”发表了独到见解与精彩评议。文中所体现的中西对话的自觉意识及其借西方文论对本国诗学传统“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的比较诗学策略，不仅与本次研讨会的精神立场莫逆冥契，而且为新世纪中国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野。

目 录

理论视野

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陈跃红 / 3

诗学论坛：中国诗学与世界

印度佛学华化与中国诗学传统 孟昭毅 门薇薇 / 23

仲春时节里汉诗唱酬的一天

——明成化十二年二月廿五日中朝诗歌交流述论 赵 季 / 38

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黎跃进 / 51

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 张晓希 / 75

“情性”说发展述评 周和军 / 88

夏目漱石《文学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影响 孟智慧 / 98

印度文化视角下《悲剧的诞生》：

摩耶与阿波罗个体化之辨 曾 琼 / 110

识“趣”辨“理”：作为诗学方法的“理趣”

——从钱锺书的《诗经》研究与戏剧批评谈起 杨 果 / 123

论菊池五山的诗学思想	赵文靖 / 143
博尔赫斯眼中的中国诗学	张如特 / 162

东西文讯

印度文坛动态	杨芊泽 / 173
韩国文学动态	许哲颖 / 176
日本比较文学最新动态	王 超 / 180
美国比较文学动态	高艺菲 / 185
法国文学动态	程安然 / 189
英国比较文学动态	张如特 / 192
荷兰比较文学学科动态	罗一鸣 / 194
加拿大文学动态	林 璐 / 199
澳洲文学动态	车 欣 / 202

◆ 理论视野

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以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为例

陈跃红

在由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世界所展开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曾经陆续有多种研究范式和研究类型被尝试运用过，然而其中突出地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首创并率先总结的研究类型，当属所谓阐发研究，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学术评价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关于“阐发”一词，英文中有一近似的词是 illumination，一般英文辞典的基本意思是：照亮、阐明、解释、启发等。阐发研究的概念提出或许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阐发研究确实只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产物，与这一西方概念并无本质上的联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类型的阐发研究，一般主要是指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去分析、阐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物，尤其是古典文学遗产，也即以形成于一种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理论批评模子去分析处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现象，有时候也有某些学人结合本土的理论方法展开双向或者多向的阐发。不过就目前为止的研究实践和成果而言，多数情况下是援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方法来处理中国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从事过这

类研究的学者，自 20 世纪初比较文学被介绍入中国本土以来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人，他们当中不仅有大陆中国的研究者，也有相当多的港台和欧美海外华人学者，还包括一批近年来崛起于汉学界，以中国文学研究为其专业学术方向的西方学者。在这支队伍中我们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学者名单，如：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即有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鲁迅、朱光潜、吴宓、钱锺书等，而从那以后的研究者就可谓洋洋大观了，仅海外学人，顺便列举便有如夏志清、叶嘉莹、高友工、梅祖麟、刘若愚、叶维廉、韩南、浦安迪、余宝琳、斯蒂芬·欧文、余国藩、伊维德等。国内学者更多。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阐发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将出现相当大的一块缺失。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也有学者尝试以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去阐发西方文学作品和现象，不过相对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就比较稀见，业绩有目共睹的学者也较少，譬如朱光潜、钱锺书、叶维廉诸人，而且他们的研究也较少以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话语去直接处理西方文学作品，多数情况下是进行双方或多方的理论比较和阐发，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与其说是一种阐发研究，倒不如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更妥当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立场来考虑与之相关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现代建设问题，阐发研究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

二

仅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吴宓到美国师从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归来，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开设相关的比较文学课程开始，有学科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学界也有了 70 余年的历史，而与之相应的阐发研究其历史甚至更长，早在“五四”以前，王国维即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小说戏曲进行过阐发研究。在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对《红楼梦》阐发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作为一般人在日常环境中由于各种

关系的牵制而形成的悲剧，《红楼梦》可谓“悲剧中的悲剧”。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即认为他的三大贡献之一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①，以之用来进行文学理论批评的著述和小说戏曲研究，这大约是中国最早期的阐发研究实践了^②。既有的资料说明，尽管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类型的正式命名，是在70年代中叶由台湾比较文学学人所确认的，但是作为一类研究类型的使用却是自世纪初以来，由大陆本土学人的前辈学者开其先河，并且以其令人瞩目的成绩影响于后人。因此，当我们立意对这一研究类型的生成原因和发展状况加以描述和总结时，就不能不从这样一个较远的历史起点开始，否则难以窥见事实的全部真实面貌。

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类型理论中并无所谓阐发研究，而它之所以在世纪初的中国很快出现，并且自中国有比较文学开始就成为一代学人情不自禁的选择，其原因是与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特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朝大国逐渐落伍于西方列强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落伍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等学术层面。至19世纪中叶，这种落伍所招致的危机已使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去向自己的西方对手求教，从对船坚炮利的欲求到对民主共和的渴慕，进而意识到批判封建文化传统、从事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性。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渐开，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新兴的西方文化与古老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必然的碰撞，文化的落差日渐凸现，中国的一代知识人士试图经由文化的更新去唤醒国人，改造民心，以发奋图强，重振中华。文学曾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② 参见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页。

要途径，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到鲁迅的弃医从文可谓一脉相承。而借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去批判性地重新理解和认识旧有的自身传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学人首选的和最有效的方法论途径，当时的人们并不忌讳这种做法，并以此为时尚而加以鼓吹。关于这方面，只要翻翻当时出版的著作和杂志即可一目了然。这其实也是所谓势所以然而又不得不然，其间既有不少主动的寻求，当然也包含诸多无奈的选择。于是，从那时至今，一切援用舶来的思想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认识和处理，都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阐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热闹一时的新理论、新方法热，90年代关于所谓理论话语“失语症”的争论，以及学界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呼吁，其间都隐含着—个潜本文，即中国缺少自己的现代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于是不得不借助于外来的、生成于它种文化系统的理论方法去分析和处理本土文化系统中过去曾有和现实发生的文学现象，也即是需要借助他者（the Other）的思想话语去阐明、照亮自己的文化和文学文本的意义。这似乎也可以称之为普遍意义上的阐发研究。这种意义上的阐发研究之所以成为20世纪中国学人自觉和不自觉的普遍学术选择，实际上，是由前面所提及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它有一个明确的学术前提，即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所存在的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明显文化落差，正是这种差距使众多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进行各种阐发的尝试。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同时又包含着一个世纪性的学术主题，即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为着这一追求，既然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自身封闭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生长出一套现代性的学术文化来，那么走向现代性的第一步，就必须开放自身，借用他人的镜子来照—照自己的形象。至于这个镜中的自我是否真是自己的真像，那当然是有待进一步去深入检验的问题。实际上，从任何理论立场对于文本的关照总是“洞见”和“不见”互生的，何况是基于文化系统差别如此重大的理论和文本之间的阐发和对话，糟糕的误读和创造性的悟读几乎

都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问题只在于我们该怎样去认识和理解这种阐发和读解。只要上述学术文化的前提和主题仍旧存在，作为其策略性学术选择的阐发研究就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被中国学术界不断运用下去。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前提和主题，我们于是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去阐发中国文学文本的研究如此之多，而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去阐发西方文学文本的情况却相对较少的原因了。实现平等的双向阐发，甚至使以中国文论话语去阐发域外文学文本成为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主流，作为一种理想的学术追求，它当然离不开学者的鼓吹和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必定有待于相关的历史文化前提和学术主题的变迁。

三

至于比较严格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阐发研究，它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上述广义的阐发研究，但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目标却大致是接近的。这里所谓的严格比较文学意义上的阐发研究，既有学科分类和理论推演限制的理由，也是几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总结，于是，所涉及的阐发研究范围相对就狭窄一些，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更加严格一些，在学理上的理性意识更明确一些。一句话，它有着学科的自觉意识。就内容和范围而言，它主要是指有意识的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批评方法，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现象，尤其是经典的、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所作的跨文化分析研究；它同时也包括以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对西方文学作品和现象作类似的处理；此外它更希望能够以两种以上文化差距较大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对多种文学作品和现象作综合的分析和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大陆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而处于与西方世界的文化隔绝状态之时，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北美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却走向兴盛。

在方法和研究类型的采用上，不少学者都势之所然地运用西方理论批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从而接续上了“五四”以来阐发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并发展为一时之盛。执教于美国的余国藩先生在1973年11月2日提交给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比较文学讨论组的论文中指出：“过去二十年来，旨在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念和范畴阐释传统的中国文学的运动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样一种趋势预示在比较文学中将会出现某些令人振奋的发展。……应该指出，运用某些西方的批评观念和范畴来研究中国文学，原则上是适宜的，这正如古典文学学者采用现代文学技巧与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一样。”^①

台湾已故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朱立民先生在评述以刊载英文比较文学学术论文为主的学术杂志《淡江评论》前三期时也指出：“许多论文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而大多数作者用的是西方现在流行的批评方法，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②

尽管这些论述从今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去看不无商榷之处。在当时也引发不少学术论争，但它确实也反映出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策略和研究类型，较容易成为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选择，并且造成了一时普遍运用的风气。这一时期毕竟和以往有所不同，学者们的学科自觉意识较强，并力图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去进行理论总结，于是，也就是在7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给予这种研究以正式的命名——“阐发法”，所谓“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之研究”^③。它虽然与我们今日作为研究类型探讨的阐发研究有所区别，但从学科的学理上来认识这种研究的特点，却是从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的。此后一些大陆学者或从方法的

① 参见余国藩：《中西文学关系的问题与前景》，载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CGL)，1974年版，第23卷，第50页。

② 古添洪、陈慧桦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4页。

③ 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2页。